

盲童教育概论

李牧子 编著



盲童教育概论

李牧子 编著

北京盲文出版社

装帧设计：周士琦

朱启环

插图：姜渭滨

责任编辑：许宗文

盲童教育概论

李牧子编著

北京盲文出版社出版

河北青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7.5印张 165千字 插图11
1981年8月北京第一版 1981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7177·003 定价 1.10元

出版者的话

盲童教育是人民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属于特殊教育的一门学科。盲童教育的质量如何，是考察整个国家教育事业发展水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标志。

自从一八五六年以后，我国各地才出现了带有“慈善”色彩的盲童学校，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了。解放后的三十年来，盲童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很大发展；盲童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果，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盲童教育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为了总结老一代盲教工作者的宝贵经验，尽快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修养，促进盲童教育的理论研究，我们出版了李牧子同志编著的这本书。这是建国三十年来关于盲童教育的第一本专门性著作，这也是我们献给“国际残废人年”的礼物。

在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曾得到上海市盲童学校、上海市教育局蔡浩中同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特殊教育研究室朴永馨同志的热情支持与帮助。在此，谨向上述单位和个人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我们对特殊教育所知甚少，再加上缺乏编辑、出版工作的业务经验，书中可能存在许多错误和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一年七月

前 言

本书是编著者从事盲童教育工作近三十年的经验总结。

书中叙述我国盲童教育的由来和发展，并根据盲童认识活动的特点和盲缺陷的补偿途径，对盲童教育的对象、盲童教育的一般原理、教学内容、教学途径和方法以及盲校班主任和教养员工作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具体的阐述。全书重点在教学途径和方法一章中，对盲校基础课程进行了探索，这对提高盲童教学质量提供了积极的经验。当然，这些都还是不成熟的初步经验，需要加以验证，有待补充和修正。

盲童教育在我国还处在摸索阶段，本书的出版，对盲童教育和有关教学中对盲缺陷补偿的初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一些空白。但作者限于学识，对盲缺陷教学浅尝辄止，有可能言不及义，理论上的错误在所难免，有待识者教正。

现阶段盲童学校的学制和中、小学的教学计划尚未统一。为此，作者提出了探讨性的看法。

本书主要根据《在认识与劳动活动过程中盲缺陷的补偿途径》（1958年科学出版社版）、《教育学（讨论稿）》（1978年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编写组）等书和上海市盲童学校教师们的教学资料编写，谨表谢意。

编著者

目 录

一、盲童教育的概况	1
(一) 盲童教育的由来	1
(二) 盲童教育的发展	10
二、盲童教育的对象	16
(一) 教育对象的分类	16
(二) 盲童的致盲原因	18
(三) 影响盲童身心发展的因素	21
(四) 盲童的感性认识	31
三、盲童教育的一般原理	47
(一) 盲童教育的目的和任务	47
(二) 盲童学校的学制	52
四、盲童教育的教学内容	58
(一) 学前教育作业训练的意义	63
(二) 中、小学课程对盲童的教育和教养意义	71
五、盲童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84
(一) 盲童学校的教学工作	84
1. 教学过程	85
2. 教学原则	86
3. 教学方法	94
4. 教学形式	97
(二) 教学过程中直观手段的应用	99

(三) 语文、数学、手工、体育等学科是盲缺陷教学的	
基础课程	116
1. 盲字字母教学	122
2. 词汇教学	137
3. 掌握数学概念	157
4. 口算教学	171
5. 泥工教学	175
6. 体育教学中的走、跑、跳绳的基本训练	187
六、盲童学校的班主任和教养员工作	197
(一) 班主任工作	201
(二) 教养员工作	213
七、盲童学校的行政组织及其工作	224

一、盲童教育的概况

(一) 盲童教育的由来

盲人失去视觉，学习文化有较大的困难。要专为盲人创造能用手指触觉辨认的凸起状的符形记号代表汉字，才能和有视觉的人一样读书、写字、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十九世纪初期，法国盲人路易·布莱尔创造了“六点制盲字符号(⠠)”的体系，又发明了盲人书写盲字的专门工具。这个成功的发明，为盲人开辟了一条通往光明之路，使他们能和有视觉的人一样，获得人类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现在我国和世界各国都采用“布莱尔盲字符号”。作为盲人书写本民族语言的工具。国外盲人为了纪念这个伟大发明的功绩，就把“盲字”叫做布莱尔 Braille。

我国盲人学习文化，多数是在有了我国盲字之后才开始的，盲童教育也随之而产生。故在此之前，我国广大盲人处在文盲阶段，他们的生活记事和记数，象原始社会里有视觉的人一样，只能用绳打结等方法，帮助记忆和记数。

我国盲人生活在长时期的阶级社会里，由于遭受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的束缚和排斥，终生默默无闻，受尽歧视和鄙弃，形同闲花野草一样，一任疾风暴雨的摧残，也无人加以丝毫的怜惜和同情。他们在此情况下，除以“宿命论”来聊以自慰外，所能采

取的生存手段，就是依靠算命、卖唱或沿街求乞，根本谈不上享受什么教育。他们终日一棍在手，踟蹰街头，风吹雨打，忍饥耐寒，苟延残喘地挣扎在死亡线上，直到最后棍子一丢，悄然离开人间为止。这幅凄凉悲惨的图景，正是几千年来广大盲人的写照和缩影。

盲人的命运和遭遇，在封建社会里是那样，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也没有丝毫的改变。自从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者即凭借了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以鸦片和宗教作为侵略的开路先锋，侵入我国内地，到处设立教堂，进行各种侵略活动。他们以“救济”为名，大办所谓“慈善”事业，企图在伪善面貌及宗教外衣的双重隐蔽下，大肆宣扬其物质文明和宗教迷信，借以麻痹人民的意志，达到其瓜分中国之目的。他们所办的“慈善事业”是多种多样的，开办“盲童学校”即其中之一。

清光绪五年(1879)，英国传教士威廉 H·穆雷，在我国北平海甸南八里庄创办“盲人、盲童班”(后称启明瞽目院)，共收男性学生十二人。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第一所盲童学校的雏形——盲人、盲童班^①。

按照时间顺序，第二第三所盲校是在清光绪十三年(1887)，由英国牧师在湖北武汉设立“汉阳瞽目女校”和“武昌瞽目学校”。

第四所盲校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李修善牧师在湖北汉

^① 据上海盲童学校1936年汇编《全国盲哑教育调查录》记载，威廉 H·穆雷的“启明瞽目院”创办于1874年。查考 C.F 戈登卡明著，1899年英国伦敦达尔尼有限公司出版的《为中国盲人与文盲发明数字符号的人》一书中，详细介绍穆雷的生平，记载他是在1879年第一个创办“盲人、盲童班”的。

口内设立“汉口循道公会训育学校”。

、次为光绪十五年(1889)，由赖马西女医师创办，传教士嘉秉道任校长，在广州市上芳村设立“明心学校”。同年，英国牧师安伯，在台湾省台南市创立“盲训院”(现名台南市盲哑学校)。

光绪二十二年(1896)，英国传教士高罗以在福建古田设立“明心盲校”。

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传教士岳爱美，官岳爱美，在福建福州设立“中华圣公会福州灵光盲童学校”。

光绪二十九年(1903)传教士沈师姑，在福建福州施埔设立“明道学校”。

光绪三十三年(1907)，传教士吴姑娘在广东韶州设立“德华盲女学校”。

光绪三十四年(1908)，传教士赵马利亚，在福建建甌设立“心光女盲校”。同年，传教士顾保林，在湖南长沙设立“长沙瞽女学校”。

宣统元年(1909)，传教士威灵·纪好弼，在广东广州设立“慕光瞽目院”。同年，由我国社会人士李志纲，在河北沧县设立“训盲学校”。

宣统三年(1911)，~~美籍~~传教士傅兰雅、傅步兰，在上海虹桥路设立“上海盲童学校”。

民国元年(1912)，传教士古姑娘，在广东汕头设立“心光盲女校”。

民国二年(1913)，传教士倪尔生，在湖南益阳县设立“湖南省益阳桃花崙信义瞽目院”。

民国五年(1916)，在湖南省长沙，官办“湖南省区盲哑学校”。同年，在江苏省南通，我国社会人士张謇公设立“南通私立

盲哑学校”。

民国六年(1917),传教士毕贤荣,在广东高要县设立“信立瞽目女学校”。同年,传教士邵来德,在湖北均县设立“均县瞽目学校”;日本医师木村谨吾,在台湾省台北市创立“训盲院”(现名台北市盲哑学校)。

民国八年(1919),传教士艾瑞英,在湖北武昌设立“私立武昌瞽目女学校”。

民国九年(1920),传教士庆真宝,在广东石岐设立“明光女学校”。

民国十年(1921),传教士施天恩、杨清华,在广西贵县设立“熙心学校”。

民国十一年(1922),传教士余素娟,在云南昆明设立“振聩瞽目学校”。同年,传教士夏时雨,在四川成都设立“成都盲聋哑学校”。

民国十四年(1925),我国社会人士郑国秀,在福建莆田设立“闽蒲水南私立盲童学校”。

民国十六年(1927),在南京官办“南京市盲哑学校”。同年,上海群学会在中华路设立“附设盲童学校”。

民国十七年(1928),在广州市官办“广州市贫民教养院盲哑残废股盲部”。

民国十八年(1929),在浙江杭州官办“浙江省区救济院盲哑教养所”。

民国二十一年(1932),在山东青岛官办“青岛盲童工芸学校。”

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浙江绍兴官办“绍兴县救济院残废所附设盲哑学校”。

民国二十三年(1934),在湖北武昌官办“湖北省立残废所附设盲童学校训练班”。同年,在福建仙游官办“仙游县盲童学校”。又在甘肃皋兰官办“甘肃省区救济院附设盲童训练班”和湖北宜昌官办“湖北宜昌县救济院附设盲童学校”。

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江苏如皋官办“如皋盲哑学校”。

另外,有创办年月不明的传教士纪刘氏,在广东广州设立“明光盲女学校”;博医会在广西贵平设立的“盲女学校”和在台湾省丰原设立的“丰原盲聋学校”。

近代盲童教育的发生和发展,在我国南方、北方、西南和台湾省等地区,前后相继开办盲校共四十二所。其中官办十一所,占总数的 26.1%;民办六所,占总数的 14.2%;外国传教士办二十五所,占总数的 59.5%。从这些数字中说明,我国的盲童教育从属于教会统治的竟占半数以上,反映了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同时也说明统治阶级对盲童教育是不重视的。

我们再看公私盲校课程的设置:有宗教、圣经,向盲童进行迷信、奴化思想教育。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设有三民主义、公民和道学等反动课程,对盲童灌输封建伦理观念和法西斯教育。其他课程有:国语、尺牍、盲字、算术、演说、社会、常识、历史、地理、自然、卫生、音乐、国乐、家政、手工、体育和职业劳动训练的藤工、竹工、织造、推拿、葵扫等科目。这些课程设置,除政治思想教育课程为必修课外,其他科目是由各校“各取所需”自行规定的。然而各校即使自行规定了课程,也不是全部开课的。

这些课程的安排,从形式上看,包含着多方面的教育内容,但其实质都是为帝国主义、封建官僚阶级的教育目的服务。例如,在传教士所办的盲学校里,盲童主要学习的不是祖国的语言,而读的是外语,学的是外国史地;又如职业劳动训练,乃是盲童

在校做苦工的代名词，为统治者谋利而设立的。上海盲校有藤工、织造两门训练科目，统治者将盲童的手工产品，招摇过市，以募捐形式高价兜售给官僚地主资产阶级，谋取私利。学生毕业即失业，为生存只能留校当苦力，谈何教育。学校设置音乐、国乐、体育等课程，是为募捐去卖唱表演，也是办学者生财之道的妙法。有资料可查的十五所盲校里，只有四所学校设有盲字课，十一所盲校不教育字，盲童不会读写盲文。瞎眼学生只凭耳朵听讲，似老嫗入庙堂听道念经，学习结果仍是文盲。这就充分证实当时盲童教育的性质：其一是灌输“宿命”思想，进行奴化教育；其二是把盲童作为牟利工具。上海盲校传教士傅步兰的办学目的很能说明问题，他假借“拯救中国盲童”为名，向国内外宣传游说，以募捐所得中饱私囊，发家致富。他在1920年募捐银洋二万元，作豪华的环球旅行。在我国的土地上，建造高贵的花园洋房，并前后购买小轿车七辆之多，供其私人享受。即我国民办和官办的盲校，也把盲童作为宣传工具，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宣扬为瞎子办学，标榜文教事业的昌盛，欺骗人民，替统治阶级点缀门面。

从招生方面也能看出当时公私办学的方向，不是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的。在1934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中统计的各省市盲校学生人数，全国仅有盲童977人入学，学生的入学年龄从四岁至二十岁不等。当时全国有多少盲童，没有资料可查，但从各校盲童在学人数中，可以窥测招生人数象蜻蜓点水寥寥无几。例如：南通私立盲哑学校，共有盲童九人；福建心光学校，全校盲童共有七人。也有盲童二人成为一所学校的，如，上海群学会附设的盲童学校就是。从盲童入学年龄的差距悬殊和招生人数的稀少，说明当时的办学是有名无实。统治者是借办学为名，

服务于反动政治，图谋个人私利。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受政治经济制约的。一个落后贫困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剥削阶级统治的旧中国，人民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是理所当然的事。失去视觉的盲童更不例外，要发展盲童教育是完全不可能的。

政治经济不仅决定教育的性质，也决定它的发展的规模与速度。文化落后的旧中国，盲童教育在国民党统治的教育部门中，只能算是一件附属物。当时的盲校，既无统一的盲文教材，更谈不上教学过程和教学原则；既无盲缺陷教学方法，又缺特殊教学形式。再看当时民办盲校的经费来源，有的靠募捐，有的靠收田租和地租。它既是附属物，又是乞求施舍办“教育”。因此，它是随着时势的变迁而自生自灭。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逃窜四川重庆，在当时只有南京盲哑学校里的盲童，迁往四川江津县双龙镇，名义上还叫学校，实已变成盲童的养老院。在日伪统治的沦陷区，私办的盲校象秋风扫落叶，则荡然无存。反之，传教士办的盲童学校，借“宗教独尊”，“保护外侨”为名，竟安然无恙，但教育也是名存实亡。盲童教育正因为是附属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理当不被反动统治集团所重视，全国盲校数量更少于前数。

概述在旧中国盲童学校变迁的历史过程，不论其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优劣，但教育的目的，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从盲童学习文化知识的语言工具——盲字而言，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开始出现了。英国传教士威廉 H. 穆雷，于 1871 年到中国北平，在劳动贫民和盲人中传教布道，有鉴于传教对象都是文盲，很难学会笔划繁多的汉字圣经，他便为有视觉的文盲发明了用数字符号识记汉字的方法学

习圣经。同时，他引进“布莱尔盲字符形”移植中国，也全部采用明眼文盲用的数字符号，设计成功为《中国数字盲字符号》，给盲人摸读汉字盲文圣经。

威廉 H·穆雷于 1879 年完成《中国数字盲字符号》的设计工作，同年就在北平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盲童学校的雏形——盲人、盲童班。

《中国数字盲字符号》是按照布莱尔的六点盲字符形，根据《康熙字典》的音韵，以北京语音代表当时北方常用单字 408 个字音，用 40 个数字符号（1 至 0 为十个基本数字盲符，作者称“小写字母”；110 至 400 分别为三十个数字盲符，作者称“大写字母”）组成 408 个音节。数字总是以两方排列为单位，每个音节由两个数字盲符组成（如遇一位数要空一方），编成密码式表示不同的读音。并以前后两个盲符点位的高低区分声调，成为汉语盲字。威廉 H·穆雷要求盲班学生在三个月内学会《中国数字盲字符号》，他编写了 408 句短句，在末字切音，便于盲人熟记理解句子末字切音的意思。盲人学习这种盲字符号，嗣后被人们称为《康熙盲字》。

《中国数字盲字符号》的出现，我国盲人才开始有了本民族的盲字，这对发展盲童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1900 年，英国传教士凯伦内来，在南京用拼音方法，以南京话的语音为基础，用“布莱尔盲字符形”制定一套有五十四个字母、每个音节由声、韵两个盲符组成的拼音盲字，称为《心目克明盲字》（也称《中国协天国音盲字符号》）。她用这套以南京语拼音的盲字在英国出版圣经，把书运回中国教给盲童阅读。由于《心目克明盲字》音节结构简短，只要记住五十四个音节，用各地方言也能拼出汉字字音，比《中国数字盲字符号》要死记硬背

408个音节，好学好用。自1919年以后，各地盲校就逐步采用《心目克明盲字》教给学生。1925年，上海盲校在《心目克明盲字》的基础上，增加了阴、阳、上、去、入五个声点符号，又补充了标点符号，于是这种盲字在当时就显得完整了。

这套盲字的特点：按照各地方言可以拼音，但没有全国统一的拼音标准；按照汉字写法字字分写，并逐字标调，但没有运用词儿连写的原则；声母和韵母各用一个符号，所谓音韵双拼再加上声点，一个有声母的音节要用三个符号拼成；符号跟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的盲文符号不同。《心目克明盲字》是在教会教育下面成长起来的，它跟教会的罗马字有若干共同之点。其缺点是要用几百个音节符形，一千九百个带调音节符形，还不能表达数以万计的汉字的音和意。就盲字本身来说，还处于低级形态，因为它还是汉字的拼音，不能成为独立的拼音文字。然而，在旧中国，能设计出我国的拼音盲字，也就为发展盲童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盲童教育的由来和产生汉语盲字的历史，仅仅只有一百多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相比我国几千年辉煌灿烂的文化，盲童教育好比沧海之一粟。由于被统治阶级所支配，盲童教育的特点是政权和教会合一，主要由教会控制，进行宗教教育，盲童被基督宗教思想训化。这种教育基本上是由帝国主义输入的。它只有办学形式，没有特殊教育理论来指导实践。概括地说，旧中国的盲童教育，不能充分发展盲童的体力和智力，使他们获得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旧中国的盲童教育是处于启蒙时期。

(二) 盲童教育的发展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我国历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的统治。使我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家,完全改变了我国的历史面貌。

全国人民得到解放,盲人也额手称庆。他们走完了漫漫的长夜而获得新生,结束了在旧社会算命、卖唱和求乞的非人生活。奴隶般的盲童当了盲童学校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给盲童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幸福前途,使他们获得和有视觉的儿童一样,平等地享受受教育的权利。作为特殊教育的一门学科——盲童教育,迎来了花香鸟语的春天!

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利用自己在经济上和思想意识上的统治地位,通过一些个人活动来实现它对教育的领导,在普通教育中私人办学和教会设校,比比皆是。尽管盲童教育是旧教育部门中的附属物,但它同样通过私人经营和教会控制,运用政权和神权的力量,有效地控制盲校。例如,在解放前夕,有些盲校学生受民主思想的熏陶,关心政治,组织学生会,反对传教士的暴力统治,提出“要自由、要改善生活”的口号,可是统治者就是运用其反动统治和神权力量,查禁学生集会,禁止盲童外出,用“不遵守校规”等名义毒打学生,进而开除赶出校门。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统治阶级的剥削制度,也就推翻了剥削阶级对教育的控制权。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盲童学校,收回了教育主权,